



## 从收入差距到财富鸿沟： 社会不平等的新趋势

王天夫

经过三十年的制度变化、经济发展与收入增长，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塑正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三十年间的财富创造已为财富积累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中第一代人以收入差距的社会结构分化，已经开始转化为决定第二代人及以后更多代人命运的财富分层。当前，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重构的动力，已经开始逐渐由收入上的差距转化为财富鸿沟与家庭消费的差异。这样的社会分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能够世代传递的、长久与持续的社会不平等。

收入上的差异对于社会结构的分化作用是显而易见。消费是收入与积累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消费与财富累积上的差异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作用或许要更为隐晦与深远。这是因为消费的差异不仅仅是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制造社会群体间的社会隔离、并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动力机制；同时，消费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机会以及与此相关的发展机会；更为深远的是家庭财产累积上的分化关系到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以及社会不平等在代内与代际间的传递与延续。这些前所未有的、崭新的社会分化动力机制势必强力冲击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并极大地影响着未来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形成。以工资为基础的居民间收入差距在加大的同时，以家庭财富差距为基础的社会分化正在形成并发挥其更为强大与深远的影响。

因此，在观察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过程中，消费与财富累积不仅是不可忽略的，而且是对理解与判断中国社会结构长远变化的更重要的题目。根据对 2002-2005 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收入与消费调查微观数据的分析，本文描述中国城市社会各阶层的消费特征与消费差异，说明它所导致的当代中国城市家庭财富累积的分化，揭示它对于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的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并讨论与之相应的政策启示。

## 一、城市各阶层的家庭收入、支出与结余

分析 2002-2005 年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与支出变化情况，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sup>①</sup>。第一，各个收入阶层的收入与支出都有较快的稳步增长，这与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相一致。在这四年间，各个阶层逐年的收入增长均在 7% 以上。最低收入阶层在四年间，收入从 2002 年的 9 千多元，增长到 2005 年的 1 万 1 千多元，而最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更是在四年间从 2002 年的 4 万 4 千多元增长 2 万元，达到 2005 年的 6 万 4 千多元。<sup>②</sup>各个阶层的消费支出也是稳步增长：最低收入阶层从 2002 年的 8 千多元，增长到 2005 年的近 1 万 1 千多元；而最高收入阶层从 2002 年的近 3 万 2 千多元增长到 2005 年的 4 万 4 千多元。

第二，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对于各个阶层而言，是不平均的。总的来讲，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都快于低收入阶层。以收入为例，最高收入阶层在这四年间累计增长 44.4%，而最低收入阶层累计增长仅为 26.6%。同样的对比也可以从消费支出的增长中得到。各个阶层（从低到高）2005 年的消费支出在 2002 年的基础上分别提高了 25.6%、28.8%、29.1%、31.7% 与 37.7%。这样的趋势导致的是，各个社会阶层不仅仅在收入上拉大了差距，在消费支出上的差距也进一步加大。相比而言，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加更多，同时他们的消费支出也增加得更多。

第三，消费支出占收入比例的变化对于各个阶层也是有差别的。各阶层的收入与消费支出都有大幅度的增长，但是与消费支出相比，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的速度快于低收入阶层的增长速度。因此，最低收入阶层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下降的幅度要远远小于高收入阶层的下降幅度。极端的例子是这四年间低收入阶层消费支出占到收入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2005 年的收入中超过 94% 用于当年的消费。而最高收入阶层中，用于消费支出的比例从 2002 年的 72% 下降到了 69% 以下。

从收入中刨除支出之后，就得到了结余。这些结余成为了家庭积蓄，既可以用来储蓄，也可以用来投资以获取更大的收益。因此，这样的结余成为了家庭财富积累的基础。

对比不同的社会阶层，其家庭结余有如下特征。首先，与低收入阶层相比，高收入阶层有着更高的结余绝对数量与相对比例。即使高收入阶层花费更多，但是他们依然可以有着比低收入阶层多得多的结余。从 2002 年到 2005 年，最低收入阶层的结余仅为收入的 5%，而最高收入阶层则可以结余在 30% 左右。

其次，低收入阶层结余的增长速度低于高收入阶层。换言之，高收入阶层本身就能够结余比低收入阶层更多的收入，更有甚者的是他们结余的增长速度在近几年间快于低收入阶层。从 2002 年到 2005 年，最低收入阶层与最高收入阶层的人均结余分别为 678 元与 2 万余元，分别增长了 44.8% 与 61.9%。

<sup>①</sup> 为了讨论方便，根据家庭人均收入的不同，在以下数据分析中城镇居民被分成五等分的收入组别，每个组别的家庭数占整体的 20%。这五个收入组别分别代表了当前中国城镇五个不同收入的社会阶层：最低收入阶层、较低收入阶层、中间收入阶层、较高收入阶层以及最高收入阶层。

<sup>②</sup> 这里忽略了不同年份间价格的变化。价格变化因素并不影响这里所讨论的趋势。

最后，如果说各个社会阶层之间消费与支出的差异巨大的话，它们的节余之间的差异则更加令人惊叹。以 2005 年为例，经过简单的换算，可以得到各个阶层在当年的节余占城镇居民总体节余的百分比分别为 1.8%、7.7%、14.4%、23.3%、52.8%。换言之，收入最高的 20% 的家庭拥有了当年所有城市家庭节余的一半以上，而收入最低的 40% 的家庭仅仅拥有不到 10% 的当年节余。

## 二、比收入差距更显著的消费差距

从家庭的绝对消费上来看，20% 最低收入家庭不到 20% 最高收入家庭的四分之一。如果说我们以前更多地关注到的只是收入差异的快速上升，中国社会的消费不均也已经逼近甚至超过其他不平等的国家。2008 年美国收入最高的 20% 家庭的消费超过了收入分布下层 60% 家庭的总和<sup>①</sup>。与美国相比，中国城市收入最高的 20% 家庭 2005 年的消费也已占到下层 60% 家庭消费总和的近 95%。如果把中国城乡人口放在一起，我国消费不平等的程度应该已经超过了美国。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进一步细分阶层，这一差距要大得多。从一个方面讲，这样的消费差异体现了中国城镇消费市场的多样性与多等级。富裕家庭可以购买和消费质量更优、数量更多的商品与服务；而贫困家庭则消费另外等级的商品与服务。换言之，富裕家庭与贫困家庭消费的商品与服务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可能完全没有重叠。

除了消费市场的多样性与多等级以外，事实上，中国城镇各阶层的巨大消费差异体现了更过深层次制度性的社会经济特征。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支出的基尼系数大于收入的基尼系数。这是一个颇具特色并令人吃惊的结果。基本的消费经济学理论认为消费支出的基尼系数通常远小于收入的基尼系数。其原因在于经济生活中有多种因素来缩小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消费差异（消费水平在生命周期上的平衡、储蓄与信贷消费、投资、转移支付、累进制的税收以及公共产品的提供等）。低收入家庭本身就没有什么储蓄；信贷因为害怕坏账，更多地贷给了信用更好，还款能力更强的富人；而国家的税收制度也并不是完全是劫富济贫。所有这些旨在提高贫困人口的消费能力的手段都没有起到作用。而中等收入阶层因为社会保障支出，其消费相对于收入也较低。至少从消费差异所反映出来的，穷人在政策与实施层面上受到了歧视，而富人得到了照顾。

比较各项具体消费支出项目，食物的基尼系数是最低的，而医疗、教育以及家庭设备的基尼系数最高，其他的几个支出项目的基尼系数则处于中间。这些数字与当前的现实情况基本相符。在经过了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居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他们在食物消费上有了基本的水平，因而整体上的差异显得并不大。与此相反的是，家庭设备里很多属于基本生存之外的需求，因而显现出了较大的差异。在九十年代之之前，城市医疗与教育基本由国家提供。家庭在这两项的消费支出在九十年代医疗与教育改革之后才开始增加。近年来，与购买住房一起，医疗与教育支出成为了中国城市居民背负的“三座大山”。

---

<sup>①</sup> 数据来源于《纽约时报》，2009 年 3 月 13 日。

家庭在医疗、教育以及家庭设备的投入直接关系到下一代在未来的生活与工作机会，成为代际差异传递的重要中间机制。

### 三、消费、节余与家庭财富的积累

收入与消费并不仅仅关系到各个社会阶层当前的生活状况，同时也与财富积累以及未来的社会分层结构紧密相关。这一点在当前变革时期的中国显得格外的突出。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社会在此变革过程中经历了从社会主义制度下财富公有到私有家庭财富开始积累的过程，同时更是因为经济的腾飞带来了中国社会资产财富的快速增值。

通常来讲，财富积累的三个途径包括储蓄、遗产继承以及资产增值。在这三个途径之中，储蓄显然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截止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居民几乎没有家庭财产的积累（见下面的讨论），所以代际间的遗产继承并不是一个积累财富的主要方式。资产增值的前提是拥有资产。对于几乎没有家庭私有财产的中国城市居民，原始的资产积累毫无疑问更多的是来源于储蓄。所以，在当前财富积累的起始阶段，城市社会各个阶层收入与消费之间的节余成为了财富积累的最重要的手段与方式。

中国城市家庭的财富积累开始于改革开放以后。而在此之前，中国城市家庭几乎没有私有资产。一系列原因形成了中国城市家庭没有财富积累的情形。改革开放的启动才逐渐打破了家庭财富上的平等。一系列的因素促成了家庭财富累积的开始，包括个人逐渐进入了市场参加经营、住房的商业化、各种社会保障逐渐市场化。

起初，财富的累积是缓慢的。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城市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开始拉大。经过了大约短短的十年，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产生了质的飞跃，由一个世界上收入最为平等的国家之一，迅速转变成一个世界上收入最为不平等的国家之一（王天夫与王丰，2006）。收入差距的拉大在改革开放初期不仅仅使得不同的家庭生活水平差距拉大，同时对于财富的累积过程有着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家庭在这一时期的财富累积还是更多地依赖收入与消费之间的节余与储蓄。在这一时期，也只有富裕家庭开始了财富的积累。

如果说八十年代的财富累积仅仅是拉开了序幕而已，那么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财富累积的加速。经过了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之后，整个中国社会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资产增值成为了现实。同时，随着人们财富的增加，投资增值也成为人们的必然选择。在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地听到人们提及房产、股票、基金等各种投资理财手段。

财富的累积过程显示了一系列的不平等现象。首先，财富累积过程中的权力因素显而易见。有研究表明在1995-2002年之间，党政干部家庭平均而言累积了比普通家庭多30-50%的财富。其次，财富累积的门槛效应以及资产增值的放大效应使得贫富差距飞速扩大。资产价格成为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阻隔了穷人的进入，使得富人成为独享资产增值所带来的利益的内部俱乐部成员。随着资产的增值，富人所持有的

资产价格进一步快速上升，累积的财富也就越来越多，也更有能力购买更多的资产。而穷人从一开始就没有能力购买资产，随着资产价格的提高，所能够做的也只有望而却步。这是因为财富累积的过程一经启动，迅速成为一个自我膨胀与放大的过程，必然加速拉大财富多寡之间的差距（王天夫，2008）。

## 四、消费差异所导致的新的社会分层机制

因为消费行为直接关联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消费上的差异直接显示了人们生活质量的差异。这样的差异能够进一步形成人们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差异：生活机会与发展机会上的差异、社会阶层呈现上的差异、以及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差异。正是由于有这些差异，社会分化才能够传递下去，形成延续持久的社会不平等。

### 1、生活机会

首先，我们以市场化的医疗与教育改革来讨论生活机会上的差异。在改革开放以前，医疗服务与教育是政府提供的近乎免费的福利，而市场化的改革使得穷人们失去了这一福利。尽管政府一直在加大医疗服务的投入，但是整体人口的健康水平还是显示出来差异。建国六十年来，整体国民的出生期望寿命已经翻了一番，由建国初的 35 岁增加到如今的 73 岁。但是，这样的变化在各个地区是不平均的。有研究表明，富裕地区的出生期望寿命已经高达 81 岁，接近长寿之国日本的数字；而贫穷地区的出生期望寿命仅有 46 岁，与战乱、病乱和贫困盛行的尼日尔数字相当（Cai，2008）。在个人层次上，因为无力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贫困家庭通常在疾病降临时拒绝上医院。而普通家庭也往往因为家庭成员的疾病治疗而陷入贫困之中。因此，贫穷与疾病往往纠缠在一起，使得低收入阶层在健康方面无法与高收入阶层相比。

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往往是生成长期持续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重要根源。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体现在两个层次上。首先，贫困地区由于整个政府教育投入的不足，使得这些地区从教育设施到师资水平都与其他地区相去甚远。这些地区学生不仅仅在受教育内容与范围上无法与其他地区的学生相比，他们也无法与其他学生在竞争激烈的升学考试的过程中相提并论，阻碍了他们进一步深造的可能。高等教育计划录取配额的分配也是严重向东部发达地区以及大城市倾斜，使得贫困地区学生的升学机会进一步缩减。其次在个体家庭层次，贫困家庭受制于支付能力，而往往犹豫是否在义务教育之外继续资助子女的教育。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以及大学生就业前景的不明朗，进一步恶化了贫困家庭子女继续深造的机会。另一个往往容易为大众忽略的情形是，贫困家庭的父母受教育水平往往不高，这使得这些孩子在受教育过程中根本无法得到父母的指导与帮助。而富裕家庭的高教育水平的父母往往在子女的教育上提供督促与指导。即使富裕家庭的父母没有能力与精力指导子女，他们通常延请价格不菲的家庭教师单独辅导子女。在中国各个城市里，中小學生名目繁多的各种兴趣班、特长班与补习班都需要父母支付额外的教育费用。如果说富裕家庭的孩子不仅可以通过缴纳择校费选择更好的学校，他们还可以在课外通过额外的学习提高；而所有的这些教育机会对于贫困家庭的孩子而言都不存在。

以上的这些问题可以在饱受社会关注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得以集中体现。农民工子女长在城市，有些甚至是生在城市，但是他们受教育的机会与其他城市小孩有着天壤之别：他们不能进入当地城市的公立学校，不能参加升学考试，也只能回到原籍农村参加高考。到了成年以后，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然而他们在城市里的发展空间因为从小累积起来的生活机会的限制而变得相当狭窄。

## 2、社会区隔

消费行为不仅仅是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同时也显示出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社会学家对于消费的关注正是在于它所带来的对社会结构的冲击。韦伯（1946）的社会阶级“三分法”指出了社会地位是划分社会等级的重要指标；而社会地位的形成与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毫无疑问包括消费行为）紧密相关。凡勃伦（1964）更加彻底地指出，某些社会成员的炫耀性消费就是为了争夺社会地位，并以此来划分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的界限。布迪厄（1984）提出了一个更大的理论框架，认为有着不同生活经历与生活方式的社会成员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不同的“阶级集团”；而这些阶级集团正是通过自己特有的生活“品味”使得自身阶级与其他阶级区分开来的。因此，人们的消费行为本身就是一个等级划分的过程——不同的社会阶层消费不同的商品，有着不同的消费习惯，并由此形成了各个社会阶层间的社会经济界限。富裕阶层在收入财富增长的同时，通常伴随着对于新鲜特殊消费行为的追逐，并将这些消费行为当成社会标志，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如果说富裕阶层消费的部分目的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品味并追逐与众不同的话，那么普通人群与穷人的消费更多地则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以及生存机会的提高。不论哪个社会阶层的消费行为目的如何，消费行为所显示出来的都可以将消费的主体分配到所对应的社会阶层之中。所以，消费行为在满足生存需求的同时，也是重要的社会排斥与社会区隔的手段与方式。

消费行为的这一社会功能在中国细分的市场结构中得到了充分的旁证。与发达国家不同，但是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似的是，中国的许多消费品市场并不是有着基本水平的标准化的供给，而是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性：既有与世界顶级奢侈消费品并无二致的，也有符合国家标准普通的，同时还有标准之外的非正式部门生产的。这些差别迥异的产品构成了不同社会阶层社会成员的消费供给。无论是食品、衣物等日常用品，还是房屋装修等等大宗消费品都显现出了这样的特征。富裕家庭使用的可能是世界知名品牌，中间阶层消费的可能是普通产品，而贫困家庭则只好更多地依靠非正式渠道提供的便宜货了。毫无疑问，这样的等级明显的消费品市场显示的正是——一个等级界限清晰的社会阶层结构。

消费市场的“筛选”功能正塑造着一个等级隔离的社会结构。以人们的空间分布为例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样一个因市场而形成的社会区隔情形。在福利分房的年代，单位聚居与大院文化是最为主要的特征。同一单位的所有家庭都居住在一起——无论官职大小，家庭贫富与否。这样的空间分割并不是以成员本身的财富，而是以工作组织归属作为依据的。在原本社会不平等程度就较低的社会中，各个社会阶层混居并密集交往，使得社会没有太严密的阶层界限。如今，住房市场化使得货币购买力成为分化居民居住区域最重要的指标。不同社会背景与社会阶层的人群往往选择不同的空间居住区域。这是因为空间上的占有往往赤裸裸地显示社会经济关系：占有优势的人群选择更好的区域，而弱势人群则被驱赶到边缘地区。这

在古今中外无一例外。在清末，北京城有“东富、西贵、南寒、北贫”的谚语；而伯吉斯所描绘的芝加哥城市的发展历程也显示了各个社会群体占据与本身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应的地域（Burgess, 1925）。这样的空间上的分布可以清晰反映出社会阶层等级。伴随着空间隔离的，往往是经济隔离、社会隔离、甚至是文化上的隔离；而社会歧视、社会敌视以及社会对立也就应运而生（如，Massy and Denton, 1993）。

### 3、社会再生产的循环圈

消费还涉及到劳动力本身作为生产者的生产与再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是通过生产者的休息、食品消耗、娱乐等各种调整行为来实现的。而在所有这些再生产的过程中，消费行为是必不可少的。不同的消费行为毫无疑问导致不同的再生产过程。以上面提到的医疗支出为例，富裕家庭平均而言比贫困家庭更有可能保持健康的身体。而在教育、住房、家庭设施、交通、娱乐等其他方面的高支出也使得高收入阶层在再生产过程中更占优势。这样的优势积累起来，使得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劳动力市场获得不同的发展机会。

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可以跨越代际界限，形成一个长期持久的社会再生产循环圈。不同阶层的家庭消费模式为子女提供了不同的生活机会。这不仅仅包括上面提到过的在身体健康程度与受教育机会等人力资本的不同，同时还至少包括以下的几个方面的不同：因生活环境不同接触新鲜事物不同而形成的独特生活“品味”的文化资本的不同、因生活圈子与父母社会关系所导致的社会资本的不同、以及因家庭财富流传所得到的经济资本的不同。所有的这些差异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孩子必然形成累积优势或劣势，又反过来对于人们整个社会分层的结构产生重要影响，长期持续地影响个人的发展，形成一个社会分层的社会再生产的循环圈（DiMaggio, 2007）。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老一辈的差距止步于老一辈的死亡。然而，当这样的优势可以通过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在代际间传递时，这样的社会差异必然将穿透时间，形成可以延续的、持久的、几乎无从打破的社会不平等。

## 五、总结与政策启示

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城市家庭几乎没有私有财富的积累，整个社会结构也是“反向分层”，并造就了一个全球最为平等的社会之一。如今，私有财产已经重返中国社会，家庭间的财富差距正在飞速拉大，成为了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分化的最为重要的趋势。总结起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家庭的收入与消费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从温饱型社会迈向小康社会。第二，城市各社会阶层的收入与消费的增长是有着较大差异的，高收入阶层在收入与消费上的增长速度都快于低收入阶层。第三，在不纳入农村人口的条件下，中国城市各个社会阶层间的消费差异巨大，已经接近其他不平等国家的消费差异。第四，不同的收入阶层的消费结构也有很大的差异。低收入阶层更多的花费用于食品与衣物等基本生活需要；而高收入阶层在教育、医疗与家庭设备等发展需求方面花费更多。第五，中国城市各阶层间收入的相对差异小于支出的相对差异，显示了相对于各自阶层的收入状况，富人消费了更多，而穷人消费了更少。第六，城市各社会阶层中，高收入阶层收支相抵之后

的结余占到压倒性的比例。低收入阶层几乎没有结余。这样的情形必然导致，第七，正在出现的中国社会的家庭财富的积累出现巨大差异。由于财富累积特有的准入门槛以及财富增值的加速度，使得不同阶层间以往的收入差距正累积成财富上的鸿沟。

这些新的趋势对于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有着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那么，这样的情形对于我们理解社会结构与寻求社会政策又有怎样的启示呢？

首先，消费逐渐成为一个鲜明的划分社会阶层的手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收入的增加与商品的丰富，中国社会的消费水平快速提高。各个阶层间的消费行为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这不仅仅反映在显而易见的衣食住行上，也反映在对于健康与教育的投入上。换言之，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有着不同的可以影响下一代的生活机会与发展机会。在一定意义上讲，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与生活几乎完全不同——衣食住行都不一样，而子女的教育也遵循不同的路径。这种崭新的分层机制在改革开放以前是没有的。

其次，以消费为划分指标的社会阶层之间的界限更加明显并加深社会群体间的隔离。这是因为这样的社会分层结构深深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时时刻刻无处不在地显示与提醒阶层间的差异，并将这样的差异用鲜明的特征标识出来。不同的阶层不仅仅在食物上衣着上不同，居住的社区也不同，甚至是上的医院学校都不同，进而生成的社会网络社会关系也各不相同——亦即整个生活轨迹没有交集。毫无疑问，这是产生社会隔离的一个完成过程。如果说以往的计划经济制造了城乡社会隔离，而如今的市场经济在城市和乡村的内部正在制造以财富与消费为衡量标准的社会隔离。社会学的常识表明，交流与沟通稀少的社会隔离正是潜在的社会对立与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当前社会上到处充斥了“仇富”与“排贫”的现象。

再次，社会各阶层的消费差异大于收入差异，这是一个与消费经济学常识相悖的令人吃惊的结果。各种经济策略与手段都没有在消费上缩小各社会阶层收入上的差异，显示了富人与穷人间相对于各自收入的巨大消费差异：前者消费更多，而后者消费更少。比较而言，富人已经消费很多，而其他社会阶层的消费则远远不够。至少有三个推论值得我们深思：一是，与富裕家庭相比，贫穷家庭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得到的相对受益要小得多；二是，当前的政府政策与整个信用市场更多的是鼓励富人消费，对于穷人则关心不够；三是，在当前拉动内需的措施当中，应当注重培育富裕人群以外其他阶层的消费能力。因为富人消费水平很高，其增长的边际有限。

接下来，收入分配对于当前贫富差距的调节或许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在改革开放以后快速上升，许多人警告了收入分配不公可能带来的潜在后果。因此有人提议，用调整收入分配的手段来扭转这种不平等状况。其实，收入上的不平等由于消费与支出的不同，已经导致了财富累积的差异。因为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贫富鸿沟会越来越大。简单的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根本无法扭转这样的财富上的不平等。到如今，或许我们只好接受不同社会阶层间财富鸿沟的事实，而开始从财产税的角度来调整收入与财富的分布（财产持有税、遗产税、资本收入税、资产增值税等等）。

另外，资产增值与工资收入的巨大差异体现了资本与劳动力价格的差距，这进一步直接导致畸形的投资取向——资本市场的投机高涨，教育成为回报不明确的投入而导致投资意愿较低。如今，即使是大学毕业也并不一定可以确保一份令人满意的工作（2009年高校毕业生的官方统计数字表明仅有68%的就业率）。教育的市场化趋势使得只有富裕家庭能够有能力与意愿加大教育投入，而贫困家庭对教育则充满疑问。除了加快发展提高劳动力价格的高端服务业以外，在转型时期，政府应当增加教育的投入。

还有，代际间资本的传递也出现了变化。资产财富可以在代际间直接传递，而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更为间接与复杂些（Bourdieu, 1984）。但在当前的情势下，结合前述对教育投入回报的不确定性，至少有两个推论可能出现。一是，人力资本的传递可能变得无足轻重，以交换劳动力得到的工资收入对于资产财富阶层变得可有可无，或许会出现并不工作的食利阶层。二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在财产资本与人力资本上都处于相对的优势，而这种优势的代际传递使得既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得到再生产，并传递下去，形成所谓的长期延续的社会不平等（Tilly, 1998）。

最后，由于资产的门槛效应以及资产的快速增值，使得城市社会各阶层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而阶层间跨过界限的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稀少与困难。有产者通过资产来积累财富，而无产者依然只能通过工资节余来积累财富。资产的门槛将穷人排出在有产阶级之外，而资产增值的过程是富人变得更富，穷人还是穷人。低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路径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而机会也变得越来越稀少。

## 参考文献

- 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 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商务印书馆, 1964 年出版。
- 王天夫: “房价上涨、财富积累与社会分化”, 《社会学家茶座》, 2008 年 5 期, 第 70—74 页。
- 王天夫, 王丰: “中国城市收入分配中的集团因素: 1986—1995”, 《社会学研究》, 2005 年 3 期, 第 156—181 页。
-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urgess, Ernest W. 1925. “The Growth of the City: An Introduction to a Research Project.” Pp.47-62 in R. Park, E. Burgess, and R. McKenzie (ed.) *The C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i, Yong. 2009.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Mortality and Health.” Pp.143-155 in D. Davis and F. Wang (ed.) *Creating Wealth and Poverty in Post-Socialist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Maggio, Paul. 2007. “Social Stratification, Life-Style, and Class Cognition” Pp.542-49 in David Grusky (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Massy, Douglas and Nancy Denton. 1993.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1998. *Durable Inequali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ebber, Max. 1946. “Class, Status, Party.” Pp. 180-95 in *From Max Webber: Essays in Sociology* (H. Gerth and C. Mills ed.).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